

# 宋代中国与非洲贸易图景研究<sup>\*</sup>

武婷婷

**【内容提要】**宋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海外贸易网络，逐步开拓了与非洲的贸易往来，初步建立了具有实质内涵的贸易体系。宋代古籍中有关勿斯里、木兰皮、层檀等国的记载亦成为宋人乃至后世了解这段中非交往史的关键信息。彼时，宋代不仅将航道延伸至北非，而且开辟了横跨印度洋，直达东非的越洋航线。随着宋瓷、宋币在非洲的相继出土，以及有关中非香料、象牙贸易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中非之间存在直接贸易联系的事实，由此奠定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形态。历史地看，中非关系不如“东亚秩序”那般有着紧密的等级政治依附与儒家文化烙印，仅有的是纯粹的经济互动，且是属于“两个文明圈”的交往。

**【关键词】**中非贸易体系；非洲古国；海上丝绸之路；朝贡关系

**【作者简介】**武婷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昆明，650091）。

## 引言

目前，学界对宋代中国与非洲海外贸易研究已有部分论著，但成果

---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我国对非洲安全合作升级版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9CGJ028）的阶段性成果。

年代多较为久远。一方面,虽然学界关于宋代海外贸易的研究已然十分成熟,形成了若干共识,如“宋代贸易中心南移与海外贸易的拓展”<sup>①</sup>“宋代的政府扶持型海外贸易政策”<sup>②</sup>,并且逐步出现部分非洲因素,<sup>③</sup>但总体上对于宋代中国与非洲贸易关系研究的关注度仍显不够。另一方面,有关中非关系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展开,且对古代中非关系具有极大的研究兴趣,围绕非洲古代地名考<sup>④</sup>、中国古代海外通道考<sup>⑤</sup>等形成了一批丰硕的成果,但对“宋代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关联性问题的阐述较少。

## 一 从想象到现实:贸易与中非关系的逐步呈现

在古代中国的想象中,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

- 
- ① 参见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第 166 页；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 11 页。
- ② 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李今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郑学檬《宋代福建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③ 诸如航道目的地等研究亦涉及东非诸城邦，乃至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古代伊斯兰王朝。详见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第 95 页；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第 169 页；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 30—35 页；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05，第 326 页。
- ④ 参见何芳川《层檀国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84 年第 1 期；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中华书局，1990；许永璋《三兰国考》，《西亚非洲》1992 年第 1 期；许永璋《老勃萨国考辨》，《文史哲》1992 年第 2 期；许永璋《层檀国试探》，《世界历史》1993 年第 5 期；周运中《宋代交通中国的层檀国考》，《海交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陆芸《宋代层檀国新考》，《海交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 ⑤ 参见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沈福伟《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周游非洲的历史意义》，《西亚非洲》1983 年第 1 期；陈公元《从贾耽的“通海夷道”看唐代中非关系》，《西亚非洲》1983 年第 3 期；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海洋出版社，1986；许永璋《古代中非关系史若干问题的探讨》，《西亚非洲》1993 年第 5 期。

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sup>①</sup>与中国“绝远”的非洲大陆亦是如此。有宋以前,古人始终没有形成较为清晰的域外轮廓,想象与现实的交融构筑了古人的域外经验,其中,现实部分的经验主要来自不充分的贸易与对外战争。唐宋以后,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逐步成为古人获得域外知识的重要方式。丰富的域外信息,不断汇聚的异域物产,使想象或成为虚幻,或落为现实。在此过程中,非洲逐步进入了宋人的视域空间,有关中非关系的记载逐渐清晰起来。

### (一) 贸易与中非关系的域外想象

中国古代有关中非关系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期。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出使西域,在其见闻回顾中谈到在西域国家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外“传闻其旁大国五、六”。<sup>②</sup>而随后回访的国家之中就包括“大国五、六”之中的“黎轩”。<sup>③</sup>有学者认为,“黎轩”便是当时罗马帝国治下的托勒密埃及都城亚历山大。<sup>④</sup>不仅如此,通过海陆双通道,玻璃品、丝绸成为当时搭建汉朝中国与托勒密埃及直接联系的纽带。<sup>⑤</sup>至此,汉人对非洲具有了初步的印象。不过,西汉中国与非洲(埃及)的直接交往或许仅是古人的想象,抑或是误读。至少在《汉书·地理志》中,班固笔下的海上通道仅至印度南端。

《汉书》作为第一本记载丝绸贸易的官史,已被多数学者用以证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上限。<sup>⑥</sup>当时,从徐闻、合浦出发的海船经都元国、甘都卢国等东南亚、南亚古国,最终至“黄支国”。但对于“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sup>⑦</sup>如此,汉朝商船并不具有与大秦商人进行直接贸易的能力。尽管来自大秦的商船在当时已将印度西南旧港穆吉里斯作为贸易枢纽,但大秦商人从事的却是埃及至印度西海岸

①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第44页。

②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就已提到古国“黎轩”。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63,第3160—3162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63,第3162页。

④ 孙毓棠:《汉代的中国与埃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第142页。

⑤ 古人对“黎轩”的命名直至公元5世纪亚历山大城衰落才结束。参见田明《汉代中国与托勒密埃及的点滴交往》,《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7—10页。

⑥ 刘明金:《从“障塞”一词看海上丝路的起始年代》,《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26页。

⑦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2,第1671页。

的贸易,印度人则承担了向东中转的功能。<sup>①</sup>因此,汉人对印度以西的认识在当时只能是间接的。

此后,东汉中国与大秦不约而同看向对方。东汉时期班超和班勇三次出使西域,积极探索经由南亚与中亚直接连通波斯湾、阿拉伯海与红海的新航路,<sup>②</sup>基本确认大秦之方位在“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sup>③</sup>而大秦于162—165年东征安息,一举打通波斯湾的东向道路,次年派使臣“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sup>④</sup>至此,中国与西方才建立起直接的交往。随后,大秦频繁来到扶南、交趾等地,用金、银、玻璃、珊瑚、象牙等奇珍异宝交换中国的丝、铁等商品。在贸易帮助下,古人域外经验虽摆脱了部分想象,但非洲元素的呈现仍不足。

## (二) 贸易与中非关系真实体现

唐宋时期,中国域外想象中的非洲元素变得逐渐清晰。唐朝,横跨亚欧非的阿拉伯帝国通过贸易与战争,频繁地开展与东方的交往。在双向互动中,非洲元素逐步出现在唐代史料之中。宋以后,随着海上贸易的全面发展,大量的域外知识涌入,有关非洲的记载较之前代更立体、翔实,内容更趋真实、可信,中非关系的域外想象逐渐具象化。

### 1. 非洲元素的初现

中国古代对非洲直接、实地感观记录的唯一唐代杜环所著《经行记》。杜环在怛罗斯战役被俘后,十余年间随大食军足迹遍及西亚北非,对北非“摩邻国”<sup>⑤</sup>有所记录,称摩邻国“在秧萨罗国<sup>⑥</sup>西南,渡大碛,行二

① 罗帅:《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西段(一)——印度西南海岸古港穆吉里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60—61页。

②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05,第174页。

③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2918页。

④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2920页。

⑤ 学界普遍考据认为,“摩邻国”地处非洲,但具体方位存在三种说法。一是肯尼亚马林迪。参见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200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陆学善等译,科学出版社,2003;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二是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王国。参见夏德《大秦国全录》,朱德勤译,大象出版社,2009;沈伟福《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三是摩洛哥或马格里布。参见张星娘编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中华书局,1977;许永璋《我国古籍中关于非洲的记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笔者认为,第三种说法较符合事实。

⑥ “秧萨罗国”已被证实为耶路撒冷,参见夏德《大秦国全录》,朱德勤译,大象出版社,2009。

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sup>①</sup>唐贾耽通过向来华的外国使者、商人进行调查，记录了一条从广州出发，可达阿拉伯世界，或可延伸至非洲亚历山大的海路通道，其间时长超过百日，且时间精确可至半日。<sup>②</sup>另外，段成式亦在其小说集《酉阳杂俎》中亦提到了位于东非的“拔拔力国”。<sup>③</sup>

贸易的推动使以“昆仑奴”为代表的异域事物流行于长安。“昆仑奴”泛指南洋地区深色皮肤的奴隶，但也包括不少来自非洲的“僧祇奴”。“僧祇”在波斯语中写作“Zang”，意为黑人，阿拉伯语同义，称“Zeng”，意指亚丁湾南岸及东非沿海的黑色原住民。<sup>④</sup>“僧祇奴”的存在使“昆仑奴”群体具有了一定非洲属性。当时，向唐进献僧祇奴，已成为南海国家的惯例。咸亨至开元间，室利佛逝“又献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sup>⑤</sup>至“元和八年，献僧祇奴四、五色鹦鹉、频伽鸟等”，<sup>⑥</sup>到“元和十年，遣使献僧祇（祇）僮五人……十三年，遣使进僧祇（祇）女二人”。<sup>⑦</sup>来自藩属国的进贡使僧祇奴的使用贵族化、上层化。

## 2. 宋代中非关系的呈现

宋人不仅对非洲古国的地理方位、海陆通道十分了解，而且对其物产资源也同样清楚，甚至就前朝容易将“大食”泛化的问题予以更正。<sup>⑧</sup>通过千余年的积淀，宋代与非洲关系的呈现不仅体现在数量递增上，更

①（唐）杜佑：《通典》卷一九三《大秦》，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5266页。

②（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七下》，中华书局，1975，第1153—1154页。

③（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许逸民注，学苑出版社，2001，第24页。学界对“拔拔力国”的认识较为一致，即索马里柏培拉，参见（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黄盛璋《中国和索马里的传统友好关系》，《世界历史》1981年第3期。

④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51页。

⑤（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下《南蛮下》，中华书局，1975，第6305页。

⑥（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下《南蛮下》，中华书局，1975，第6302页。

⑦（后晋）刘昉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蛮西南蛮》，中华书局，1975，第5273页。

⑧ 宋以前，普遍将南海诸国大部视为大食，泛化了大食的疆域范围，对此，宋朝进行了区分，如称层檀国仅“人之语音如大食国云”。参见（宋）周辉《清波别志》，载《全宋笔记》第五编（九），大象出版社，2012，第165—166页。

突出在记载的详尽上。

有宋以来涉及非洲古国记载的古籍较之前朝数量倍增,且记载的非洲地名也更多、更翔实,与中非海上通道建设互为支撑。

宋时,涉及非洲元素的古籍类型多样,既有诸如以《宋史》为代表的官史,也有诸如《太平广记》《古今说海》《文昌杂录》《清波别志》《岭外代答》《诸蕃志》等笔记、小说以及地理志,尤以《诸蕃志》为最。而上述古籍中所收录的非洲地名也已突破想象的限制,且更具方位感。

涉及北非的地名包括“木兰皮国”“默伽猎”“勿斯里国”“遏根陀国”与“陀盘地国”等。<sup>①</sup>《岭外代答》与《诸蕃志》皆称:“大食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尔。”<sup>②</sup>而《诸蕃志》又载:“默伽猎国,以大食佛经用一函乘在骆驼背前行,管下五百余州,各有城市。”<sup>③</sup>其还称“勿斯里国,属白达国节制。……其国多旱,管下一十六州,周回六十余程……”。<sup>④</sup>涉及东非的地名主要有“弼琶啰国”(“拔拔力国”)、“中理国”、“俞卢和地国”以及“层檀国”等。<sup>⑤</sup>在《诸蕃志》中,赵汝适记录“弼琶啰(拔拔力)国,有四州,余皆村落,各以豪强相尚”,<sup>⑥</sup>而对“中理国”则称“国有山与弼琶啰国隔界,周围四千里,大半无人烟”。<sup>⑦</sup>

① 对这些非洲古国名,学者已有考据。其中,“木兰皮国”亦称穆拉比特,“默伽猎”则指代马格里布。《岭外代答》成书于12世纪,《诸蕃志》稍晚。而在11—13世纪,现今马格里布地区先后出现了两代柏柏尔人建立的伊斯兰王朝——穆拉比特王朝与穆瓦希德王朝。且在《诸蕃志校释》中,杨博文称:“在当时,‘木兰皮国’实力范围囊括今摩洛哥、西撒哈拉、毛里塔尼亚,乃至西班牙部分地区。”这与两代柏柏尔人王朝信息相吻合。参见(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18页;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第64页。“勿斯里国”为埃及,而“遏根陀国”与“陀盘地国”则位于埃及。参见(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19—123页。

②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载《全宋笔记》第六编(三),大象出版社,2013,第27页;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17页。

③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34页。

④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20页。

⑤ “弼琶啰国”亦称拔拔力,为锁码柏塔拉,或索马里北部地区。“俞卢和地国”地处肯尼亚沿岸的基卢普和格地两座古城。参见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中华书局,1990,第278页;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海洋出版社,1986,第118页。

⑥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02页。

⑦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05页。

古籍中出境率最高的非“层檀”<sup>①</sup>莫属。《宋史》《岭外代答》《诸蕃志》《清波别志》《文昌杂录》对其地理位置同有收录，而各籍中“层檀”“层拔”“昆仑层期”的表达亦属同义。

此外，《清波别志》《岭外代答》《诸蕃志》《宋史》对中非之间的贸易路线亦有记录。涉及沿线中转点、风向的记录有据可查、准确可行，如此一来，中非之间的交往想象就有可能成为现实。《岭外代答》称木兰皮国“盖自大食之陀盘地国发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sup>②</sup>当然，周去非也有“若夫默伽国、勿斯里等国，其远也，不知其几万里矣”<sup>③</sup>的感叹。作为出境率最高的层檀，《清波别志》与《宋史》认为，通往层檀的海道需“便风百六十许日，昼夜行。经勿巡、占林、三佛齐乃至广州”。<sup>④</sup>

不仅如此，宋代古籍对非洲古国风土人情、物产资料等认识更深，且贸易的落脚点是基于对朝贡的认知。其一，对非洲风土人情的概览。《岭外代答》称木兰皮“日晷长三时，秋月西风忽起，人兽速就水饮乃生，稍迟，以渴死”。<sup>⑤</sup>《清波别志》称层檀“气候春冬暖，贵人以好越布缠头，服土产花绵白叠布，不服绫罗绢布”。<sup>⑥</sup>在《诸蕃志》中，赵汝适以“多骆驼、绵羊，以骆驼肉并乳及烧饼为常饌”<sup>⑦</sup>来描述“弼琶

① 有关“层檀”的考证，学界主要有三说。一是“塞尔柱土耳其说”。参见藤田丰八《宋代之层檀国》，何健民译，载《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第222页，转引自何芳川《层檀国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第178页；《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第1071页；陆芸《宋代层檀国新考》，《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2期。二是“阿拉伯半岛说”。参见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海洋出版社，1986；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中华书局，1990；周运中《宋代交通中国的层檀国考》，《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三是“桑给巴尔说”。参见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何芳川《层檀国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许永璋《层檀国试探》，《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刘鸿武、暴明莹《蔚蓝色的非洲——东非斯瓦希里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层檀位于非洲桑给巴尔。

②（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载《全宋笔记》第六编（三），大象出版社，2013，第117页。

③（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载《全宋笔记》第六编（三），大象出版社，2013，第122—123页。

④ 参见（宋）周辉《清波别志》，载《全宋笔记》第五编（九），大象出版社，2012，第165页；（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国六》，中华书局，1977，第14122页。

⑤（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载《全宋笔记》第六编（三），大象出版社，2013，第117—118页。

⑥（宋）周辉：《清波别志》，载《全宋笔记》第五编（九），大象出版社，2012，第165页。

⑦（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02页。

啰”；而对于层檀，则曰“其人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缠青番布，蹶红皮鞋。日食饭面、烧饼、羊肉。乡村山林多障岫层叠，地气暖无寒”。<sup>①</sup>其二，对非洲物产资源的概览。《岭外代答》称木兰皮“所产极异，麦粒长二寸，瓜围六尺，米麦窖地数十年不坏。产胡羊高数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数十斤，再缝而活，不取则羊以肥死”；<sup>②</sup>称层檀“产大象牙、犀角。又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sup>③</sup>如此人口亦商品，周去非以“昆仑层期”指代“僧祇”，或许是受到“昆仑奴”的影响。《诸蕃志》称弼琶啰“产龙涎，大象牙及大犀角，象牙有重百余斤，犀角重十余斤。亦多木香、苏合香油、没药、玳瑁至厚。他国悉就贩焉”。<sup>④</sup>同样，认为层檀“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sup>⑤</sup>《清波别志》称层檀“有犀、象、薰陆、沈水香、血竭、没药、鹏砂、阿魏、苏合香、真珠”。<sup>⑥</sup>其三，对中非贸易性质的判断。在宋人看来，中非之间的交往认知，是落脚于朝贡的。《文昌杂录》称“俞卢和地国”与诸蕃国一样“礼甚厚，皆著例录，付之有司”。<sup>⑦</sup>而周辉同样将宋代与层檀的关系视为一种朝贡，称其“国朝承平日，外国朝贡，闲数年必有之，史策但书某国贡方物而已，如封域风俗，皆略焉，独于层檀所书如此”。<sup>⑧</sup>

宋代古籍对非洲元素的记载基本勾画出了中非关系的全景，为后人了解宋人有关非洲在哪、怎么去非洲、去非洲干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奠定了基础，建立了中非贸易关系的基本认知。

①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00页。

②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载《全宋笔记》第六编（三），大象出版社，2013，第117—118页。

③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载《全宋笔记》第六编（三），大象出版社，2013，第117—118页。

④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02页。

⑤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00页。

⑥ (宋)周辉：《清波别志》，载《全宋笔记》第五编（九），大象出版社，2012，第165—166页。

⑦ (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载《全宋笔记》第二编（四），大象出版社，2006，第116页。

⑧ (宋)周辉：《清波别志》，载《全宋笔记》第五编（九），大象出版社，2012，第165—166页。

## 二 从继承到拓展：贸易与中非海上通道的建设

中非贸易通道的构建带有明显的发展特性。最初，中非航线继承了起源于汉代，经隋唐五代发展的近海航线。然而，随着陆上交通的梗阻与衰落，以及经济重心的南移，宋朝致力于开拓海上通道。宋朝商船不仅可以直接跨越诸如东海、黄海、暹罗湾、孟加拉湾之类较小的海区，而且可以横跨北印度洋，从东南亚直航西亚与东非海岸。<sup>①</sup>

### （一）传统航线的继承

中非贸易最早的航线便是继承于汉唐开辟的大陆沿岸航线，当时，广州与泉州是宋代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从广州、泉州出发，经南海至兰里则是汉唐“南海航线”的传统线路。囿于造船与航海技术，及方便补给，中国远洋船只在当时仅限于沿大陆架展开远航，最远可达波斯湾。这条航线带动了沿岸多个地区的对外交往，逐渐形成了数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港口。其中，位于苏门答腊岛北端的兰里甚至发展为中国船只远航的中继站。

中非建立初步联系是东西方两大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大秦开通了从埃及、埃塞俄比亚，穿越阿拉伯海至印度的航线，<sup>②</sup> 对接我国西汉时期就已开辟的从徐闻、合浦出发，沿中南半岛，绕孟加拉湾至印度半岛的南海航线。<sup>③</sup> 但是，直至东汉中国才同大秦构建了直接的海上交通线，<sup>④</sup> 至此，中国与非洲的海上通道初步成型。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虽战乱频繁，但航海事业仍在继续。孙光圻认为，孙吴时期的朱应、康泰，两晋时期的僧人法显维持着当时的南海航线，直至南朝刘宋时期出现较大发展，航线可达波斯湾。<sup>⑤</sup> 在唐朝时，这条传统航线已可至东非沿岸，如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载了从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东非桑给

①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05，第326页。

②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5页。

③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05，第128页。

④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第2页。

⑤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05，第150—152页。

巴尔的航程。<sup>①</sup>

在前朝的基础上,宋朝继承了这条传统“南海航线”。其一,宋朝依然将东南亚作为重要的贸易中转地,大食国海商以“本国所产多运与三佛齐贸易,贾转贩以至中国”。<sup>②</sup>同样,《宋史》也记载层檀国曾取道三佛齐与中国进行贸易。<sup>③</sup>可见,三佛齐、阁婆、兰里在宋朝海外航线中依然发挥着重要枢纽作用。其二,宋代与大食的交往仍沿袭前代模式,即“必自故临易小舟而行”<sup>④</sup>至波斯湾,而大食国来宋则需“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sup>⑤</sup>故临乃是这条传统航线上的重要节点。其三,宋代仍在继续使用唐朝开辟的东非航线,《宋史》中记载的层檀国使者来华路线与唐代前往东非的航线相一致。<sup>⑥</sup>

## (二) 越洋航线与新航路的拓展

不过,传统航线属傍岸而行的大陆架航线,沿途所受限制较多。至东非,往往需要在故临换小船而至,这样往返一趟需换船两次,耗费大量的物力人力,对当时的贸易商人来说是不划算的。宋朝两浙市舶司曾在隆兴二年规定,出海贸易人员“若在五月内回舶,与优饶抽税。如满一年内,不在饶税之限。满一年之上,许从本司根究,责罚施行”。<sup>⑦</sup>这促使精明的贸易商人探寻更为便捷的航线。此外,宋朝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发展为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证,中非航线出现了新的发展。

一是发展出横跨大食海(阿拉伯海),从故临直达麻离拔(亦称嘛啰拔,今阿曼)的跨海航线。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了一条从广州出发到达麻离拔的路线:“有麻离拔国,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兰里。……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

① 详见(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七下》,中华书局,1975,第1153—1154页。

②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91页。

③ (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国六》,中华书局,1977,第14122页。

④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载《全宋笔记》第六编(三),大象出版社,2013,第113页。

⑤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载《全宋笔记》第六编(三),大象出版社,2013,第123页。

⑥ (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国六》,中华书局,1977,第14122页。

⑦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4218页。

风方到。”<sup>①</sup> 据孙光圻计算，从兰里出发，傍岸而行前往麻离拔国约需 116.5 天，如兰里横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直达麻离拔国约需 62.5 天，这与周去非记录的时间基本一致。<sup>②</sup> 另外，《诸蕃志》中也有一条相似的航线，所不同的是，国内出发港由广州变为泉州。此时泉州港已取代广州成为宋朝海外贸易第一大港。综上，宋朝的航海技术已经不再仅限于沿着海岸线航行，而是可以直接跨越海区到达目的地，体现了宋朝较高的航海与补给水平。

二是延伸了经非洲之角，穿曼德海峡，过红海至勿斯里、木兰皮的北非航线。在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船只已能够到达波斯湾。经斯坦因考证，该条航线可远至亚历山大。<sup>③</sup> 甚至，孙光圻认为这条北非航线可延伸至木兰皮国。<sup>④</sup> 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此条航线不仅为埃及开罗出土的宋代古瓷的来源提供了一种解释，也进一步证实了宋代中国与埃及、马格里布地区存在直接联系的可能。

三是开辟了从兰里过马尔代夫群岛，横跨印度洋直达东非沿岸的越洋航线。巴兹尔·戴维逊曾称：“从技术上讲，12 世纪前后，中国船只已经能够航行到任何船只所能到达的地方。”<sup>⑤</sup> 在东非桑给巴尔沿岸发现的宋代钱币，及在肯尼亚沿岸出土的宋代瓷器是中非进行直航贸易的有力证据。《岭外代答》记载，从广州至兰里需 40 日。孙光圻计算，从兰里出发经马尔代夫群岛，横跨印度洋抵达东非海岸也只需 40 日。<sup>⑥</sup> 因此，兰里—马尔代夫群岛至东非航线耗时较少。而从经济角度看，该条航线在返程回国时的价值更大。据上文所述，中非之间已存在两条航线，且南宋在海外船只返程时间上有明确规定，超过一年没有回国，不但要严查原因，还需受罚。一般来说，宋代商船在东北季风末期，即冬末春初

①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载《全宋笔记》第六编（三），大象出版社，2013，第 116 页。

② 孙光圻：《郑和是我国开辟横渡印度洋航线的第一个人吗？》，《海交史研究》1984 年第 6 期，第 2231 页。

③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第 95 页。

④ 孙光圻：《郑和是我国开辟横渡印度洋航线的第一个人吗？》，《海交史研究》1984 年第 6 期，第 320 页。

⑤ 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屠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第 271 页。

⑥ 孙光圻：《郑和是我国开辟横渡印度洋航线的第一个人吗？》，《海交史研究》1984 年第 6 期，第 22 页。

抵达东非,在贸易结束后,前两条航线的返程海况又不甚理想,需等到八月后才能返航,以致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返航。<sup>①</sup>但是,四月至九月正是当地乳香贸易的黄金季节,而唯有选择“兰里—马尔代夫群岛至东非航线”回国,不仅可以进行乳香贸易,而且还能避开北印度洋的恶劣海况按时返程。

### 三 从一般到特殊:贸易与中非交往的商品表现

宋朝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就一般性而言,陶瓷、香料,以及象牙不仅是宋朝对外贸易的常规性商品,也是中非贸易的主流。特殊性则集中体现在非洲出土的宋代钱币上:一是在历时比较上,较其他朝代,宋币出土数量最多;二是在国别对比上,与宋代其他贸易对象相比,宋币出土数量又偏少。

#### (一) 中非贸易的一般性表现

宋代中国与海外诸国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从输出和输入两方面来看,以缙钱、铅锡、杂色锦、瓷器等物为主要输出口,以金银、市香药、犀象、珊瑚等物为主要进口商品,<sup>②</sup>其中,在中非贸易中,以瓷器、香料、象牙最具代表。<sup>③</sup>

#### 1. 瓷器在中非贸易中的联结作用

在宋代中国的海外贸易中,陶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宋朝海船所到之处,以及和宋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宋瓷的进口,<sup>④</sup>非洲也不例外。根据阿拉伯文和中文资料的记载,11 世纪前后,非洲的进口品主要有陶瓷、布匹、珠子和玻璃制品,<sup>⑤</sup>数量最大的进口货是来自中国

①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第 109 页。

② (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7,第 4558—4559 页。

③ 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第 167 页。另外,因为丝绸的不易保存性,尽管丝绸作为宋朝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但在当前非洲出土报告中仍鲜有提及。因此,本文未将丝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④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 36 页。

⑤ M. 埃尔·法西主编《非洲通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3,第 557 页。

的青绿釉陶器,以及黄黑、青蓝和白色的瓷器。<sup>①</sup> 北非埃及的福斯塔特和东非坦桑尼亚的基尔瓦便是非洲重要的宋瓷聚集地。

在北非出土的中国古瓷多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埃及是非洲发现中国古瓷最多的地方,其中,此前作为埃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福斯塔特(开罗),在1912年因出土大量中国古瓷而引人注目。<sup>②</sup> 三上次男曾夸张地表示:“走在开罗的任何地方都会闻到中国陶瓷的气味。”<sup>③</sup> 经其统计,福斯塔特遗址中的中国陶瓷碎片多达12000片,几乎包括了从唐朝至清朝的著名陶瓷。<sup>④</sup> 其中,宋初的越窑青瓷和定窑白瓷,以及高质量的龙泉窑青瓷在此亦大量出现。<sup>⑤</sup>

在东非地区出土的中国陶瓷多集中在商道与港口。在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交界的古商道遗址中均发现了12世纪的中国青瓷。同时,东非沿岸的许多港口,如曼达岛北部的曼达城、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均出土了宋朝古瓷,<sup>⑥</sup> 以至于东非有着“中国古瓷的储仓”的美称。据考古分析,上述出土瓷器时间大致处于10—12世纪的北宋。美国菲利亚美术馆学者亚历山大·波普认为,基尔瓦岛的城市遗迹中包含10世纪的越州窑瓷和白瓷碗,<sup>⑦</sup> 从而将非洲古瓷历史追溯至唐末宋初。大量出土的龙泉青瓷、耀州窑瓷、南方青白瓷等强有力地证明瓷器已深入当地居民生活之中。例如,基尔瓦“大清真寺”遗址出土的宋代青瓷莲纹碗残片和素面洗残片均属于龙泉窑中的生活用瓷。<sup>⑧</sup> 对此,国外学者表示,10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sup>⑨</sup>

非洲出土的宋代瓷器几乎包含了当时宋代社会主流瓷器。其中北宋

① M. 埃尔·法西主编《非洲通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3,第558页。

②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第1页。

③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胡德芬译,文物出版社,1984,第23页。

④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胡德芬译,文物出版社,1984,第14—15页。

⑤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第5页。

⑥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第8—27页。

⑦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胡德芬译,文物出版社,1984,第52页。

⑧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第26页。近年来,随着非洲考古工作的推进,以秦大树为代表的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瓷器在非洲实现了“去商品化”的过程,即瓷器的装饰性、象征性功能取代了传统的盛装食物的实用功能。

⑨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第18页。

中后期就已停烧的越窑青瓷的出土,至少可以证明,中国与非洲在北宋中前期就已经有了某种贸易联系。继而兴起的龙泉青瓷作为宋代最主要的出口瓷器,在非洲的大量出土绝不是偶然。

其一,经济地理因素。偏安一隅的南宋将海外贸易作为其重要的收入来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瓷器的大量出口。龙泉青瓷的主要产地距离泉州较近,而且,随着泉州港的迅速兴起,从南宋开始,泉州港附近出现了一批专供出口外销的龙泉窑场。<sup>①</sup>其二,宗教文化因素。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古代就已经能通过区分不同民族的特点来进行贸易。<sup>②</sup>在青瓷兴盛的宋代,北非正处于法蒂玛王朝(907—1171 年)统治时期,因其崇尚绿色,在我国古籍中也称“绿衣大食”。而东非斯瓦希里城邦国家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绿色在其宗教文化中极为重要。因此,宋代青瓷在埃及福斯塔特与东非基尔瓦等遗址中大量出现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此外,近年来的非洲考古报告显示,肯尼亚出土的宋代瓷器数量远不如坦桑尼亚,<sup>③</sup>结合中非贸易航道来看,这一发现与中非贸易航线有关。东非沿岸作为瓷器的终端市场,坦桑尼亚基尔瓦或许是宋代商船在冬季沿印度洋季风洋流抵达东非的第一站,完成贸易后,继续北上抵达肯尼亚沿岸,此时正值当地乳香收获季节,收购完毕则沿西南季风返回国内。

## 2. 非洲香料与象牙“东传”的可能

宋代史料中并未直接明确香料、犀象来源于非洲,但非洲东海岸以盛产龙涎香和象牙而闻名,其产地主要位于索马里,瓜达富伊角素来就有“香料角”之美誉。<sup>④</sup>唐宋古籍在谈及今索马里时,都强调此区域盛产香料以及象牙。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就曾提到拔拔力国“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sup>⑤</sup>《新唐书》中亦称:“海中有拔拔力种……多象牙及阿

① 叶文程:《晋江泉州古外销陶瓷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79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②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第 87 页。

③ 详见刘岩、秦大树、齐里亚马·赫曼《肯尼亚滨海省格迪古城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文物》2012 年第 11 期;秦大树、徐华烽、默罕默德·玛初拉《肯尼亚蒙巴萨塔纳号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 年第 2 期;丁雨、秦大树《肯尼亚乌瓜纳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考古与文物》2016 年第 6 期。

④ 张铁生:《从东非史上看中非关系》,《历史研究》1963 年第 2 期,第 128 页。

⑤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许逸民注,学苑出版社,2001,第 64 页。

末香”。<sup>①</sup> 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也提到,“弼琶啰国……产龙涎、大象牙及大犀角,象牙有重百余斤,犀角重十余斤”。<sup>②</sup> 此外,桑给巴尔同样亦是香料、象牙的重要产地,“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sup>③</sup> 从古籍记载可见,唐宋时期,我国对非洲龙涎香及象牙的产地已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宋代开国不久,宋太宗在雍熙四年(987年)便派人到海外“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sup>④</sup> 宋代从海外贸易中进口的商品主要也为“香药、犀、象、珊瑚等物”,<sup>⑤</sup> 且太平兴国初“象犀、珠玉、香药、宝货充牣府库”。<sup>⑥</sup>

阿拉伯人马苏迪约在915年访问非洲后表示,“象在黑人土地(即非洲东海岸)上是极其普通的……他们猎象仅仅是为的要杀它们,大象牙就是从此地取得的,大多数象牙都运到阿曼,再从阿曼转运到印度和中国”。<sup>⑦</sup> 他据此判断,来自东非的象牙早已是古代中国宫廷方面所重视的奢侈品。随着象牙贸易的兴起,作为象牙中转站的阿曼,也已逐渐成为波斯湾通往印度洋,沟通中国的重要通道。正如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也曾记录了一条从广州直达麻离拔(阿曼)的海上航线,这或许是中非象牙贸易的有力证据,中非贸易有了更为直接的表现。

## (二) 非洲出土宋代钱币的特殊性

已有考古数据显示,在东非沿岸出土的文物中共发现中国古钱币330枚(见表1),其中可以确定的有唐代4枚,五代1枚,北宋142枚,南宋64枚,明代10枚,清代4枚。<sup>⑧</sup>

由此可见,非洲出土的宋币数量为最,但在横向国别考古比较中,这一数量远不如其他地区。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货币本位制的演变,而且体现了中非之间虽有贸易联系,但后者并未进入宋代贸易的“核心圈”。

① (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下》,中华书局,1975,第6262页。

②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02页。

③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00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4203页。

⑤ (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7,第4559页。

⑥ (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7,第4559页。

⑦ 张铁生:《从东非史上看中非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第128页。

⑧ 马文宽:《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及意义》,《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36—37页。

表 1 东非宋朝钱币出土统计

单位：枚

| 国名   | 出土地点   | 总钱币数量 | 宋朝钱币数量 |
|------|--------|-------|--------|
| 索马里  | 摩加迪沙   | 44    | 14     |
|      | 布腊瓦    | 2     | 1      |
|      | 梅尔卡    | 1     | 0      |
| 肯尼亚  | 给地     | 3     | 2      |
|      | 安哥瓦那   | 6     | 5      |
| 坦桑尼亚 | 达累斯萨拉姆 | 1     | 0      |
|      | 桑给巴尔岛  | 236   | 156    |
|      | 马菲亚岛   | 9     | 3      |
|      | 基尔瓦岛   | 28    | 25     |
| 总计   |        | 330   | 206    |

资料来源：马文宽：《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及其意义》，《海交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第 36—38 页。

其一，供需关系失衡致使铜币自宋以后逐步失去了主流货币地位，流入非洲的宋币稍多，但明清铜币较少。宋朝的“钱荒”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钱禁”制度也未能阻止铜钱外流，其根本在于供需关系的失衡。据《宋会要》载：“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sup>①</sup> 宋神宗时期废除钱禁，更进一步加剧了铜钱外流。《宋史》记载：“……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sup>②</sup> 在此困境下，市场赋予了白银货币的资格。<sup>③</sup> 从两宋白银货币化开始，至明中期以后，铜逐渐被白银取代，不再作为中国主流货币，银本位取代了铜本位。<sup>④</sup> 这亦是非洲出土明、清铜币较少的原因。

其二，非洲诸国并未进入宋朝的主流“交际圈”，中非朝贡关系存疑。在常规贸易与朝贡贸易下，回赐、博买与走私构成了宋代货币外流

①（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 8372 页。  
②（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八十《食货下二》，中华书局，1977，第 4384 页。  
③ 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第 246 页。  
④ 参见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杜恂诚、李晋《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

的三种主要途径。<sup>①</sup> 在宋代朝贡贸易中，仅铜钱回赐便上万缗的数目，而走私数量则更为庞大。在回赐部分中，依外来商品折价回赐具有一定参考意义。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朝回赐给朝贡国的铜钱少则一万贯（缗），多则六万四千缗（贯）。<sup>②</sup> 但《宋会要辑稿》中记载的来自非洲的俞卢和地入贡，获商品折价回赐仅 2900 贯，<sup>③</sup> 与前相比差距较大。此外，有关层檀两次入贡的记载中，虽未有具体回赐金额，但作为层檀故地的桑给巴尔出土的宋币也仅 156 枚。据此或许可以推测，非洲尚未进入宋代朝贡体系这一“核心交际圈”，中非朝贡关系存疑。非洲出土的宋币很有可能是宋代商人在当地博买物资留下的，抑或是部分东非商人夹带而回。在古代东非城邦，主流的贸易对象仍是阿拉伯人，且在 13 世纪以前是以姆潘得贝壳作为当地主要的支付手段。<sup>④</sup>

这一系列考古案例既是宋代钱币外流的一个侧面，也是古代中国与非洲之间贸易互动的一个表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非贸易正处于由间接走向直接的过渡时期。13 世纪以前，姆潘得贝壳为东非地区的主要支付货币，宋代货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币作为辅币的可能，<sup>⑤</sup> 而且又部分印证了宋代商人跳过阿拉伯商人的中转，直接与东非商人进行交易的可能。另一方面，反映出非洲作为重要原料地的历史地位。东非城邦国家作为香料、象牙的原产地与主要输出国，吸引着亚洲各国商人至此进行贸易活动，<sup>⑥</sup> 宋朝中国商人亦不例外。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一艘宋朝的货船远航至东非，用宋币与当地商贩讨价还价的场景。

最后，宋币的出土甚至反映出宋代铸币术的高超及其收藏价值。宋代钱币制作精美，钱币的形状、穿孔的大小、轮廓的阔狭、铜色的配合等都相当完善，尤其在钱文、对钱（同一种年号钱同时用两种或三种书体）上体现了美术与文学的完美结合，<sup>⑦</sup> 是中国古代货币文化高峰，宋币深受海外诸国喜爱。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

①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 44 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九，中华书局，2004，第 7276 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 9828 页。

④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05，第 325 页。

⑤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 54 页。

⑥ 何芳川：《古代东非沿海的城邦》，《世界历史》1983 年第 5 期，第 8 页。

⑦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 262 页。

贮,以为镇国之宝。”<sup>①</sup> 因此,非洲出土的宋代钱币也有被当时的非洲商人当作进口商品收藏的可能。

#### 四 “海丝”雏形与“朝贡”论争: 中非贸易体系的历史内涵

总览中非贸易,无论是北非的勿斯里、木兰皮国,还是东非的弼琶啰与层檀等沿海城邦,都带有浓厚的阿拉伯因素;在通道建设方面,跨洋航线的开通,更是宋代航海技术的体现;瓷器作为传统贸易优势产品,依然占据了中非贸易的核心,钱币的外流则进一步证明了中非之间的直接贸易往来。

一方面,航线的拓展与延伸,越洋航线的开辟实现了中非的直接贸易,此时完整版“海上丝绸之路”雏形初现,奠定了元明两代建立同非洲联系的基础。

两汉与西域交通贸易的发展及汉政府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与葱岭以西各国的交往,而且保证了商路的便利和安全,中西商品往来频繁,且品种多样。其中就包括当时亚历山大城著名的琉璃工艺品、细布和各种宝石。<sup>②</sup> 可是,这一时期中国与非洲的联系,在陆上往往通过安息、大月氏等国的中间商转手;而在海上,印度人则扮演了这一角色。至东汉时,中非往来仍需经大秦帝国。巴兹尔·戴维逊认为,除埃及亚历山大港以外,努比亚地区的“库施王国”,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也曾通过印度与往来于印度洋西端的汉朝船只建立间接贸易联系。<sup>③</sup>

唐代,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先后成为中非贸易的中间商,尤以阿拉伯人为最。公元 7 世纪后,阿拉伯人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控制了西亚和红海两岸。史书记载,“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sup>④</sup> 标志着阿拉伯帝国与唐朝建立了外交关系,使节往来不断,这为发展中非关系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 8372 页。

② 孙毓棠:《汉代的中国与埃及》,《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2 期,第 145 页。

③ 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屠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第 272 页。

④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中华书局,1975,第 5315 页。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sup>①</sup> 彼时，唐朝商人和商船渡过波斯湾后，便可进入阿拉伯帝国的疆域，但事实上仍是通过阿拉伯人与北非、东非进行间接贸易。<sup>②</sup>

至宋时，“中国人首次从事大规模海外直接贸易，不再依靠外国中间商”。<sup>③</sup> 当时，不管是商品结构还是贸易范围，乃至贸易制度与航海技术，宋朝在世界上均占据主导优势，不但中非直接贸易成为可能，而且描绘了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版图的基本轮廓，甚至元明两代均未超越。中非交往时期的贸易往来塑造了完整版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筑造了中非交往的海上通道。

另一方面，随着直接贸易的实现，具有经济因素的“朝贡”亦随之而来，但中非之间的“朝贡”关系属于无政治、文化牵绊的“非朝贡”形态。

所谓朝贡，即藩属国对宗主国按时进献礼品和方物，采用中国王朝的年号、年历，以此表示臣服；而宗主国作为回报，则对藩属国进行回赐、封赏，用以体现天朝恩典。<sup>④</sup> 从这一界定可以看出，要符合朝贡体系不仅要具有经济联系，更有赖于政治依附关系，是“经济+政治”的模式。但到底是经济优先，抑或政治优先，学界尚有争论。

费正清与滨下武志一致认为，经济因素是古代中国朝贡体系运行的基础。<sup>⑤</sup> 但全海宗认为，朝贡关系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仍是基于政治。<sup>⑥</sup> 同时，何芳川也认为，朝贡体制是“华夷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政治保证。<sup>⑦</sup> 因此，政治性仍是朝贡关系的主导。

除经济、政治两大体现朝贡关系的“硬指标”外，“文化”这一“软实力”同样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滨下武志强调，商业交易虽是朝贡关

①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2页。

②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8页。

③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61页。

④ 付百臣：《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第1页。

⑤ 参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3页。

⑥ 全海宗：《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载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103—104页。

⑦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38页。

系的推动力,<sup>①</sup>但仍需要依靠“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是基于权力,本质是东亚特有的儒家文化。同样,费正清等认为,朝贡和贸易是一套机制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sup>②</sup>其目的仍在于跨越风俗习惯、文化差异的鸿沟。基于两位学者对明清两代的朝贡研究可知,朝贡有着特殊的区域经济圈,是“亚洲才具有的唯一历史体系”,<sup>③</sup>儒家内核的“基础性文化圈”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高明士认为,古代中国朝贡体系实际上就是以“礼”为基础的,是以亲疏远近为判断依据的关系型结构,<sup>④</sup>从属于中国古代“天朝礼治体系”下的朝贡,其实是以“三礼”(礼仪、礼义、礼治)及礼治主义为其运作形式,推行儒学和儒术,建立儒化体制。<sup>⑤</sup>这也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元互动,协同推进了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发展。

但就中非交往历史来看,经济更为优先,政治与文化则不足,这一关系通过“回赐”制度有所体现。宋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密切对外关系,多数“南海诸国”进入了宋代朝贡体系,<sup>⑥</sup>宋代政府对其进行了丰厚的回赐。<sup>⑦</sup>在《诸蕃志》中,明确记载了地处非洲的俞卢和地及层檀有派使节来宋朝贡。<sup>⑧</sup>据称,熙宁六年(1073年),“大食俞卢和地国遣蒲啰洗来贡乳香等,诏香依广州价回赐钱二千九百贯,另赐银二千两”。<sup>⑨</sup>1071—1083年便有三层檀使节来华记录:熙宁四年(1071年),层檀使团向宋神宗赠送“珍珠、龙脑、乳香、琉璃器、白龙黑龙涎香、猛火油、药物”。<sup>⑩</sup>元丰四年(1081年),“大食层檀国保顺郎将层伽尼请备礼

①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3页。

② 黄纯艳:《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1期,第56页。

③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8页。

④ 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和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9页。

⑤ 黄纯艳:《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1期,第58页。

⑥ 付百臣:《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第4页。

⑦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第397—418页。

⑧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第300页。

⑨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828页。

⑩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956页。

物，诣阙谢恩”，批示“宜多给舟，令赴阙”。<sup>①</sup>元丰六年（1083年），层檀国保顺郎将层伽尼再次来华，“神宗念其绝远，诏颁赉如故事，仍加赐白金二千两”。<sup>②</sup>

据此，国内学者将中非贸易同样纳入宋代朝贡体系，<sup>③</sup>且认为经济优先。<sup>④</sup>但依据“三要素”模式与我国学者重视的“政治优先”来评估，对于中非朝贡关系的认识，不仅史料并未记载有非洲国家采用宋朝的年号、年历以表示臣服的信息，而且在文化方面更属于华夏与伊斯兰两个文明圈的互动。上述两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非关系内在“朝贡”因素的有限。

公元7世纪以后，阿拉伯帝国已在亚欧非建立了“穆斯林秩序”，<sup>⑤</sup>至10世纪时，其辐射影响力已至俞卢和地及层檀等非洲国家。大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移民东非沿岸，<sup>⑥</sup>不仅带来了伊斯兰教，也带来了自己的贸易传统和贸易网络，东非海岸城邦兴起，诞生了诸如以层檀为代表的历来以出海经商为营生的城邦国家。<sup>⑦</sup>事实上，这是一个与“华夷秩序”完全不同的伊斯兰文明圈。有关古籍中记载的诸如“层檀入贡”或许如白寿彝所说那般，“大概都是商人出头充当贡使，而非国使性质”，<sup>⑧</sup>从而使得中非的“朝贡”关系看上去更像是根据文献演绎出来的，是虚幻而非真实的。<sup>⑨</sup>

中非贸易的经济优先有别于“南海市场”与“东亚体系”，或许尚不能用“朝贡”关系概括之。并且，“非朝贡”的认知使双方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得以在历史长河中轻装前行，在追求复兴发展的过程中彼此

①（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959页。

②（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国六》，中华书局，1977，第14123页。

③ 参见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35页；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第161页；许永璋《宋代中国对非贸易探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68页。

④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第463页。

⑤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33页。

⑥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第72页。

⑦ 佐伊·马什、G. W. 金斯诺思：《东非史简编》，伍彤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7页。

⑧ 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上册），中华书局，2003，第268页。

⑨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第8页。

互相遥望着对方。<sup>①</sup>

## 结 语

中非贸易建立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古人对于非洲的想象已不再是想象，现实成自然。围绕非洲在哪？怎么去非洲？去非洲干什么？宋人在古籍中呈现了中非关系的全景。不仅传闻中的非洲古国如层檀、木兰皮、勿斯里有据可查，而且在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推动下，继承传统海上线路，开辟越洋航线，中非直接贸易得以实现。与宋代海外贸易相似，陶瓷、象牙、香料在中非贸易中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基尔瓦“大清真寺”与“大房子”遗址是宋代瓷器集中之地，其与在桑给巴尔等地出土的宋代钱币都是证明这一历史关系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

【责任编辑】王严

---

① 刘鸿武：《当代中非关系与亚非文明复兴浪潮——关于当代中非关系特殊性质及意义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9 期，第 30 页。

point in its policy towards Africa. However, the policy now faces the lack of political influence, strategic guidance, systematic and sustained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other challenges. In order to compensate for its relatively weak hard power, ROK has in recent years taken a different approach in its public diplomacy. It is now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positive image of the country in Africa through “soft power”.

**Keywords:** ROK; Afric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ublic Diplomacy

## A Study on the Trade Pictur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n Song Dynasty

*Wu Tingting* / 59

**Abstract:** A relatively complete overseas trade network had been formed in Song Dynasty, at the time,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had already begun, so the trade system of China and Africa had a certain substantive content. The record of the “Wu Si Li” “Mu Lan Pi” “Ceng Tan” in Song Dynasty books also became the key information which the people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even later generations to understand this period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 At that time, the Song Dynasty not only extended the sea-route to North Africa, but also opened up a trans-oceanic sea-route to East Africa. Since then, the possibility of direct trade between Song Dynasty and Africa was confirmed, with the discovery of Song Dynasty porcelain and coins in Africa, as well as the records of the spices and ivory in So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se information, the Sino-African “Maritime Silk Road” was shaped. As a result, although the Sino-African trade system in Song Dynasty was not as close as the “East Asian”, it was not illusory. In fact, economic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but the lack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shaped the Sino-African uniqueness of “Unconspicuous Tribute System”.

**Keywords:** Sino-African Trade System; Ancient African Countries; Maritime Silk Road; Tributary Relationship